

狩猎采集社会研究述评

查干姗登

[摘要] 狩猎采集社会研究一直是社会人类学和考古学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有其独自发展的特点。总结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狩猎采集社会的研究可知,人类学的许多重要的理论和方法都是通过对狩猎采集社会的研究而获得的,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被视为人类社会最自然和本质的生活方式。从进化论到现代性的讨论,狩猎采集社会研究已经为社会和文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诸多的理论观点。

[关键词] 狩猎采集社会 原住民 喀拉哈里论战 第四世界 小民族

[中图分类号] C9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10) 05-0066-06

农业文明之前,狩猎采集曾是全人类所共有的生计方式。依据考古调查资料,狩猎采集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已有百万年的历史。狩猎民族在学术上的称呼有狩猎采集民族、食物采集者、^①原住民、土著人等。食物采集者和狩猎采集民的称呼都与狩猎民族的生计方式相关。而原住民等称呼被联合国及相关组织普遍接受和使用,具有法律效力。这些食物采集者或者被称为狩猎采集民的社会都是一些规模小的(社会单位小),没有复杂技术的(没有机器化的生产工具),没有复杂社会组织的(没有社会阶级),或以上三种类型结合的社会,学术界将这种社会又称为简单社会(simple societies)。^{①②} 狩猎采集社会研究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有其独自发展的特点。20世纪60年代“狩猎民大会”成功举办,这次会议成果《狩猎者其人》(man the hunter)被誉为现代狩猎采集社会研究的起点。本文对狩猎采集社会研究脉络的梳理也是以该书的发表为起点,并对其后狩猎采集社会研究的主要理论进行归纳和整理。

一、狩猎采集社会研究与《狩猎者其人》

早在17、18世纪,狩猎采集社会研究作为人类本质讨论的观念,主要是从社会进化和文化变迁的角度来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受达尔文进化主义观点的影响,初期的狩猎采集社会研究中,学者为了探究前农业时期人类的原始生活状况,将狩猎采集社会当作人类社会的原始模型——“活化石”。^② 单线进化主义是人类学产生之初的主流观点,持单线进化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按照单线进化的原则进行的,每个社会都会走相同的进化路线,从低级向高级阶段进行,狩猎采集社会是所有发展阶段的初级阶段,因而也是最为原始的阶段。正是受该观点的影响,狩猎采集社会的研究在某种程度

作者简介 查干姗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275)。

^①史密士在其著作《人类史》一书中,引用佩里的博士论文《太阳之子》所使用的“食物采集者”来指称“那些原始的游牧民,他们没有为获得更丰富更可靠的食物供应而采取任何手段,即未从事农业也未从事畜牧业”。

^②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正是从考古学观点对“活着的社会”(living society)的研究,将狩猎采集社会看作是“活化石”,看作是古老社会的“遗存”,民族考古学家研究这样的社会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考古学发现的物质遗存,特别是在物质文化模式和社会其他方面建立起系统的关系,是民族志材料和考古学材料的比较研究。通过对“原始的”狩猎社会的研究来解释前农业社会的人类文化和社会原型。

上呈现出了多样性的特点。如弗洛伊德将狩猎采集者，尤其是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看作是最落后、最悲惨的野蛮人，他们没有长久居住的房屋，除了狗没有别的家畜，依赖狩猎和采集为生，没有族长，没有崇拜更高级生物的信仰。^{[2] (P2)} 学者在对待狩猎采集社会研究中人类社会最为本质化存在讨论时有着不同观点。可以看出，他们期待狩猎采集社会能够作为一种最为本质的社会形态存在，这种存在可以很好很直接地去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存在的最根本的条件和因素，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最为本质的方面。

自 1960 年代开始，狩猎采集社会研究发展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分支。1966 年，“狩猎民大会”在美国芝加哥成功举办。1968 年，李查德 (Richard Lee) 和德沃尔 (Devore) 将大会研究成果整理后出版了《狩猎者其人》。这本著作不仅综合了考古学、生物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狩猎采集民进行了全面的跨文化研究，开启了人类学在新方法和分析上的框架。人类学界期待这样的研究能够达到对旧石器时代开始的前农业时代的人类社会文化研究的目的。在《狩猎者其人》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狩猎采集社会被视为孤立的整体，无论狩猎采集社会是否被外界的力量影响，它与外界社会系统总缺少联系。有关狩猎采集民社会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平均主义、缺乏财产私有权、缺少剩余劳动产品、资源能够共享等方面。学界透过进化论的观点，认为狩猎社会处于人类文明发展最为落后的阶段。

进化论者的研究曾一度引发了人类社会研究的新范畴。在《狩猎者其人》出版后的 20 年里，人们对进化论的研究方式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最常见的是关于狩猎采集社会研究在人类历史研究中的地位问题。狩猎采集民所在的地区通常是殖民地区。在殖民的过程里，狩猎采集民已经和外界发生联系。他们需要和殖民者、外来的商人、甚至农民打交道，这样来看纯粹的狩猎采集社会已经不存在。狩猎采集社会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整体社会，它和外界有接触，与外界社会发生着相互影响和作用。通过狩猎采集社会的研究来达到对人类社会史的研究的方法遭到质疑。继而以狩猎采集民与外界人群接触而带来的文化冲突与变迁的研究代替了纯粹的 (pure) 狩猎民社会的研究。凯瑟琳 (Katherine A. Spielmann) 和詹姆斯 (James F. Eder) 合著的《狩猎采集者和农民：过去和现在》研究了生活在非洲、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狩猎采集民与食品制造者 (农民) 之间的交换关系，进而研究了狩猎采集民和农民的相互作用下狩猎民的民族认同，这可以说是对狩猎采集民社会研究的新视角。^{[3] (P303-323)}

从《狩猎者其人》之后的研究可以看出，关注的角度已经出现了本质上的变化。这些研究少了生态和进化的观点，多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少了各学科 (考古、生物、社会学) 的整体研究，多了人类学的专业研究；少了对科学性的讨论，多了批判和反思。^{[4] (P2)} 狩猎采集社会作为无国家、无文字社会，被进化论者当作是对人类社会史研究的范本，忽略了这些社会与外界世界的交流。狩猎采集社会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在殖民者踏上这块领土时，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就已经开始出现变化，狩猎采集社会与外界的交往在研究中是需要被重视的。同时，狩猎采集社会被当作是落后于我们现代所谓文明社会的进化论思想也必须被剔除，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依据他们对于环境适应的选择，这种选择在研究里需要被尊重。1998 年的第七届国际狩猎采集社会研究大会上，有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狩猎采集社会在精神与情感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也是对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狩猎采集社会人群的社会文化生活巨大变迁的反思。

二、《狩猎者其人》之后的主要研究

1990 年，第六届狩猎采集大会在英格兰的费尔班克斯举行，李查德在会上总结了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狩猎采集社会研究的六个关键问题，包括进化主义、最优觅食策略 (optimal foraging strategy)、女性采集者 (women the gatherer)、世界观与象征分析 (world view and symbolic analysis)、史前狩猎采集者 (hunter-gatherer in prehistory)、历史中的狩猎采集者 (hunter-gatherer in history)。^{[5] (P32-33)} 2003 年，英国人类学家巴纳德 (Alan Barnard) 依据 1990 年后狩猎采集社会研究的发展趋势，补充了狩猎采集者与外来人的关系 (relationship with outsider)、原住民的心声 (indigenous voice) 两点。^{[6] (P5)} 而这两点与后文将要讨论的“卡拉哈里论战” (Kalahari debate) 与“原住民论争” (Indigenous people)，密切相关。

(一)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主要研究

要理解狩猎采集社会研究历程还需用一种历史的角度去探讨狩猎采集者的概念。上文所述, 17、18世纪狩猎采集社会的研究中心集中在对于社会本质的讨论, 而后人类学对于狩猎采集社会的研究呈现出了更多元化的研究思路。“财产”(Property)研究在狩猎采集社会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财产”关系研究涉及到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财产的制造与生产、财产的分配和消费等。狩猎采集社会在研究中被描述成是拥有以下特质的社会: 食物共享、平均主义、生产能力低与物质资料积累的匮乏、劳动按照性别分工, 这些特质与“财产”研究是密不可分的。“财产”研究可以说是狩猎采集社会研究的方法论之一。财产研究同时也可以被用来当作研究现代社会的参照物, 通过狩猎采集社会财产关系的研究来比照西方社会的“财产”问题所涉及的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进行学术反思, 如关于萨林斯所提出的“原始的富裕社会”的讨论。人类学更多地从关注于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研究视角来探讨财产关系(property relationship)、权力(power)与平等关系(relations of equality)。“财产”研究的重要的人物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伍德伯恩(Woodburn)。他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对狩猎采集民族哈扎人(hadza)做过民族志的调查, 对非洲坦桑尼亚的土著民族的族群进行过比较研究。伍德伯恩认为有两种根据经济和社会组织而进行食物搜集的社会, 即即时回报系统(immediate return)和延迟回报系统(delayed return)。即时回报系统以食物资源的快速消费为基础, 延迟回报系统以食物资源剩余积累为基础。即时回报系统灵活并依赖多样而可选择的策略, 延迟回报系统则拥有大量收获和季节性的资源。即时回报社会与延迟回报社会两者在组织和思想体系上存在着矛盾, 这些矛盾中最为突出的是作为狩猎采集社会核心的生活方式的普遍的互惠与作为农耕和放牧的核心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7](P431-451)} 即时回报的经济系统的维持是由社会结构和以平均分配为原则的价值体系决定的; 延迟回报的经济系统在经济上依赖资产的获得和保持, 财产的损失可能导致延迟回报的经济系统向即时回报的经济系统转变。^{[8](P47)} 这些研究发现了人类社会不是简单的单线进化的过程, 生态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在本质上对进化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20世纪70年代初, 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采用“实质论”(substantialism)的经济人类学观点来批判经济学的形式论(formalism)。他批判那些主张用西方经济学概念解释非西方文化的论点, 指出现代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存在着根本差别。萨林斯提出了财产研究方面的另外一种思路——“原始的富足社会”(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他认为狩猎采集社会的人们在获得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要比周边的农民所花费的时间要少得多, 狩猎采集民最大程度地获得了自身的自由活动的时间。萨林斯批判了长期流行于西方经济学的进化理论, 即认为原始、传统的非西方社会(尤指狩猎采集社会)是生活在饥饿边缘的经济类型, 他认为这是完全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9](P1-40)} 随着研究的深入, 研究者从狩猎采集社会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角度, 主要围绕财产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两个中心话题探讨了人类社会有关权力与平等的社会问题。如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北美的原住民和少数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成为了所居住社会里的边缘人群, 这种边缘导致了原住民族群认同。

最优觅食策略是一种行为模式, 它基于一个前提, 即用最少的劳动赢得最大获得食物的机会。布鲁斯(Bruce Winter Halder)和艾瑞克(Eric Alden Smith)编著的《狩猎民的觅食策略》展示了狩猎采集社会在生存策略的经济“合理性”, 合理性是适应进化的产物。^[10] 这个观点很快遭到了其他学者的反驳。英戈尔德(Ingold)认为最优觅食策略将适应性与合理性混淆了, 最优觅食策略提出了抽象的行为模式, 但却不能完全解释这些行为模式, 也就是说, 在分析觅食行为产生的文化原因时, 最优觅食策略研究向生物学的方向走得太近了。^[11] 然而, 这种跨学科研究的努力导致了对于生物、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研究讨论的兴趣。《狩猎采集者: 一个多学科研究的视角》^[12] 这本书的核心之处在于从生态、生物和社会多方面的视野去分析狩猎采集社会。史前狩猎研究的视角主要是考古学的研究, 该书对石器时代狩猎采集社会研究的概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 根据考古挖掘的材料对狩猎采集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策略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如狩猎采集社会的维生之道研究就是很突出的一个方面。维生之道(subsistence)

属于生存策略研究。这种研究在考古学的研究里比较多，很多论著都是根据获得的考古数据来推断石器时代或者更早时期狩猎采集社会的生存策略。更进一步的研究企图透过这种生存策略发现背后的内在的社会和经济系统。史前狩猎采集社会研究中关于定居点与生存策略研究的讨论也比较多，简单地说，维生之道就是在一个生态系统里，水草季节性的变化导致定居点的移动，而定居点的变化是人类为了生存适应生态环境而引发的一种生存策略。在狩猎采集社会里，狩猎点的变化和季节气候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人们要不断地移动来寻找适合生存的地点。随着季节的变化也可以说是随着时间的变化，移动的空间也在发生变化。如米歇尔的《狩猎采集者的生存之道与定居》^[13] 试图建构狩猎采集者的经济行为的模型，建立这个模型的目的是为了预测特定的生态环境里的狩猎采集社会的经济本质。

狩猎采集社会研究中将女性作为狩猎社会中的采集者身份进行探讨，属于人类学中女性研究的部分。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在人类学对于小规模社会的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关于性别关系本质的研究。女权主义者批判的出现使得人类学开始关注之前一直被忽略的权力和控制之间的关系。平等社会的平等主义是男性的平等主义，女性的角色与地位被忽视了。这个时期涌现出许多关于狩猎采集社会性别不平等研究的专著，如奎因的《女性地位的人类学研究》、德弗罗的《圣洛伦索地区的性别差异与不平等关系》、利科克的《不平等社会的女性地位：社会进化的解释》等。

（二）喀拉哈里论战（Kalahari debate）与“原住民”（indigenous）论争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狩猎采集社会研究中出现了“卡拉哈里论战”。论战的关注点集中在非洲南部地区喀拉哈里沙漠中生活的狩猎采集民族 Ju/'hoansi 布须曼人的研究中。而讨论的中心问题是 Ju/'hoansi 布须曼人独立性的程度——对外界依赖的程度。人类学界对 Ju/'hoansi 布须曼人研究有两种观点：一是 1950 年至 1965 年间，理查德和美国哈佛大学卡拉哈里研究团体认为 Ju/'hoansi 布须曼社会是独立的和相对富裕的社会；二是维尔姆森认为 Ju/'hoansi 布须曼人是被外界经济利益边缘化、被驱逐的下层阶级。^[14] 在这场论战里，持“独立性”观点的学者被称为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s），而持相反观点的学者被称为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s）。传统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围绕着布须曼社会研究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论战中传统主义者认为，布须曼社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而修正主义者反对将狩猎采集社会看作是一个独立社会的研究方式，他们认为布须曼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自生自灭的文化系统，它以下层社会的形态参与到整体社会的历史与形成过程中，应该将之放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的社會系统中来加以讨论。^[16] 修正主义者认为传统研究忽视了布须曼人与外界接触而产生的对于布须曼社会的影响。在论战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关注狩猎采集社会与外界接触交往关系的思考。狩猎采集民族也可以被称为觅食民族（Forager），他们与生活在其周围的农民、畜牧民（herder）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不仅是简单的发生作用，问题在于这些作用产生的结果，对狩猎采集社会包括对政治系统、经济系统以及信仰系统的影响又表现在哪些方面。

2003 年，阿丹姆·库珀尔在美国当代人类学期刊中发表了一篇名为《本土人的转变》的文章，对原住民的概念做了批判。他提到了生活在非洲南部地区的布尔人后代努力尝试进入原住民的劳动群体会议的大门，然而其他原住民族并不认同他们，让他们丧失了进入会议的机会。^{[15] (P389-402)} 从历史上来看，布尔人的祖先来自 17 世纪以前从欧洲移民过来的欧洲白种人，他们在非洲领土上生活了几百年，其后代却不被其他非洲原住民族认同。在当地获得原住民的身份意味着有更多的权力去争取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资源。由此，有学者提出“原住民”应该被视为一种政治概念而非学术概念。

“Indigenous”有很多的含义，尤其用它来描述一个族群是土著的、原住的意义时，其意义指向变得更加丰富。如西塞尔提出了一个族群满足“原住民”的四个标准：第一批来的（first-come）；没有统治（no-dominance）；文化差异（cultural difference）；自我归属（self-ascription）。^{[16] (P40-42)} 这四项标准的提出却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驳。如库珀尔认为，西塞尔所提的四个标准都存在问题，居住在非洲南部地区的众多族群迁来时，他们的祖先们有的可能是在同一个时期到来的。艾兰·巴纳德认为，西塞尔趋向强调

土著“理性”的和“过程性”的方面与巴特（Barthian）的“民族性”（ethnicity）类似，他不赞成库珀尔对“原住民”概念的完全否定，认为“原住性”（indigeneity）涉及到一个群体对另外一个群体的控制关系，尤其是不同群体和趋向保护非原住民的利益要多于原住民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17] (P13-15)}

“原住民”的论战已经超越了西方社会的学术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敏感度，这个概念已经成为原住民争取土地等权益的政治工具。库珀尔在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回应了巴纳德的观点。他对原住民概念的理解与巴纳德有差异，他将原住民概念看作为一个绝对的人类学学术概念，而反对将原住民看作是法律概念与政治化工具的取向，并认为将原住民作为政治诉求合法化、工具化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关系。^{[17] (P15)}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这场论争是对国家与民族（nation-people）关系的讨论，而其中又涉及到了种族问题（race）。从当今原住民运动的发展来看，原住民概念的论争不仅仅是对一个学术概念的简单讨论，而是已经成为原住民族在这场运动中用来保卫自身文化与权益的手段和工具。

（三）第四世界与原住民的声音

西方世界对如非洲、美洲、澳大利亚等地区进行殖民统治后，企图用西方原有的“民族—国家”的理念去征服殖民地区，原住民的生存受到重大的挑战和考验。原住民生活的地区资源遭到破坏、土地被占用、外来文化冲击使得传统社会面临瓦解的威胁。这些都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围绕狩猎采集研究，许多文章都在努力探讨如何争取狩猎民的政治权利、经济发展、语言、文化保护等。如马库斯（Marcus Colchester）的《原住民的权力》（Indigenous Peoples' Power）（2005），描述了全球土著争取和保护自身土地、资源的斗争，探讨了未来原住民社会可能要面对的强大挑战。

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开始，北美地区的原住民社会运动大张旗鼓地展开了，这个趋势不断向外蔓延，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原住族群里得到积极响应。这些跨国性的运动所要求的政治诉求大体一致，那就是土地权、文化权、语言维系权、经济自主权，以及重要的政治地位（其中包括自治、自决、半独立甚至独立）。^{[18] (P5-6)}“第四世界”的概念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孕育而生的。1974 年，世界著名的原住民运动倡导者乔治·曼努埃尔（Geogre Manuel）与迈克尔·珀斯郎斯（Michael Posluns）共同出版了《第四世界：印第安的现实》一书。在书中，作者强调印第安世界应该是有别于各种世界性政治体系和政治意识的存在，它属于自主独立的第四世界。第四世界的人民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权利自由来往，有权利平等地与政府谈判，并提出最有效地达成第四世界的方法就是自治。在曼努埃尔的观念里，他所认为的第四世界就是原住民联盟，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追求自治或自决。^{[18] (P12-13)}然而，“自决权”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自决权必须是在满足国家政府利益的前提下，当原住族群运动对于政府来说有过激的行为时也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在这场运动中，原住族群仍是被动的一方。^{[18] (P14)}

1990 年，在第六届费尔班克斯国际狩猎采集大会上，有很多学者呼吁支持狩猎采集民获得权利，批评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对狩猎采集民的控制。这也是当今狩猎采集社会研究的重点所在，很多文章都是在争取狩猎采集民作为弱势群体在现代化话语下的利益保障、权益保障以及生存保障。李查德将表述提升为更高的研究层次，他将狩猎采集社会放入到世界体系的框架之下进行讨论。1992 年，他撰文对以往的狩猎采集社会研究从认识论、方法论和意识形态等三方面进行了批判和反思。他认为狩猎采集研究在表述上存在危机，狩猎采集社会研究在以往研究中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转化，而其最初进行研究的理由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提出狩猎采集社会研究需要关注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语境之下，狩猎民、政治经济与世界体系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19] (P42)}

由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狩猎采集社会的文化面临消亡的危机，我国学术界也开始关注原住民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生存与发展问题。2001 年 7 月，费孝通先生在“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作了题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讲演。他在中国东北的鄂伦春族、赫哲族以及西南地区的裕固族、撒拉族和土族等人口较少民族调查中发现了这些民族在现代信息社会中的尴尬处境和困惑，将全国 22 个人口 10 万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称为“小民族”、“小小民族”。费先生提出解决这些民族面对的现实问题，需

要学术界的研究者们能够做好扎实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在这之后，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关注“小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如2003年麻国庆教授发表了《全球化与文明对话中的周边的边缘民族：狩猎采集民的“自立”与“苦恼”》，他以在全球话语下文化和区域上被边缘化的狩猎民族——鄂伦春族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对先住民族地域开发的合理性以及在开发过程中狩猎民族的适应性的问题。^[9]之后，他又发表了《开发、国家政策与狩猎采集民社会的生态与生计——以中国东北大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族为例》（《学海》2007年第1期），在对于全球范围内的狩猎采集民的研究在人类学的学术定位以及他们目前面临的共同的社会、生态等问题的基础上，分析了鄂伦春族所处地区的自然生态和人口变化，重点探讨了1949年以后的森林开发、定居化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禁猎转产”等政策，对当地生态环境影响的同时，如何使原住民族——鄂伦春人的生计、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上所述，从进化主义到现代性的批判，狩猎采集社会研究为人类社会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诸多重要理论观点和可操作经验。同时，国外狩猎采集社会研究对我国小民族研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 [1] Berreman, G. D.. Scale and social relations [J] . Current Anthropology, 19, 1978.
- [2] 弗洛伊德. 图腾与禁忌 [M] . 文良文化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 [3] Katherine A. Spielmann and James F. Eder. Hunter and Farmers: Then and Now [J] .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3, 1994 .
- [4] Eric Alden Smith. The Current State of Hunter-Gatherer Studies [J] .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1.
- [5] Lee Richard B.. Art, Science, or Politics? The Crisis in Hunter-gatherer Studies [J] .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92.
- [6] Alan Barnard. Hunter-Gatherers in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Hunter-gatherers [M] . Berg Publishers, 2003.
- [7] James Woodburn. Egalitarian Societies [J] . Man and Series, Vol. 17, No. 3 (September 1982).
- [8] Roy Richard Grinker. Houses in the Rainforest: Ethnicity and Inequality among Farmers and Foragers in Northeastern Zaire [M]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9] Marshall Sahlins. Stone Age Economics [M] .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1972.
- [10] Bruce Winter Halder, Eric Alden Smith. Hunter-gatherer Foraging Strategies: Ethnographic and Archeological Analyses [M]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 [11] Tim Ingold.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M] . Routledge Press, 2000.
- [12] Catherine Panter-Brick, Robert Layton, P. Rowley-Conwy. Hunter-gatherers: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3] Michael A. Jochim. Hunter-gatherer Subsistence and Settlement [M] .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1976.
- [14] Edwin N. Wilmsen. Land Filled with Flie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Kalahari [M]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15] Adam Kuper.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J] .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44, No. 3 (Jun, 2003).
- [16] Sidsel Saugestad. The Inconvenient Indigenous [M] . Nordic Africa Institute, 2001.
- [17] Alan Barnard. Kalahari Revisionism, Vienna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Debate [J] . Social Anthropology, 14 (1), 2006.
- [18] 谢世忠. 族群人类学的宏观探索: 台湾原住民论集 [C] . 台北: 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04.
- [19]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 全球化下的中国与日本: 海内外学者的多元思考 [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杨向艳